

我国 1.3 万余人名叫“春节”

“春夏秋冬”皆为姓

本报讯 14日,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查询中心”)公布一项最新的姓氏统计数据:我国有22653859人名姓里带“春”字,其中,单字名为“春”的有7231465人,姓春节的有290人,名字为“春节”的有13469人。“春夏秋冬”皆为姓氏。

“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老百姓在取名时也对“春”字情有独钟,据“查询中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

22653859人的名字里含有“春”字,这个数量占到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76%。其中,有7231465人名姓里带“春”字。

中国最传统、最热闹的“春节”也是人名,据“查询中心”统计,我国名字为“春节”的有13469人,安徽、河南、江苏三省最多。北京名为“春节”的有303人。

此外,在名字里含“春”的两千多万人中,228773人名姓为“迎春”,107743人名姓为“新春”,74323人名姓为“立春”。从地域分布

来看,东北人对“立春”这个名字尤为喜爱,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叫“立春”的人数分别位居全国第一、二、四位。

我国的姓氏文化博大精深,春、夏、秋、冬不仅是四季的名称,也是姓氏。

根据“查询中心”统计,我国春姓人数28323人。春姓主要分布在云南、内蒙古、安徽、河南、四川五个省份,其他省份春姓户籍人口数均不足1000。北京春姓人数为228人。

“夏”是“春夏秋冬”四姓中最为常见的姓氏,我国有4254549人姓夏。统计显示,江苏省的夏氏户籍人口最多。“秋”是个古老的姓氏,秋氏相传为黄帝裔玄孙少昊的后代。据统计,全国秋姓人口总数为22707人。陕西省秋姓人口居全国首位。

“冬”是比较稀有的姓氏,我国冬姓人口仅为15661人。安徽省冬姓人口最多。据《北京晚报》

亿万富翁被特批当农民 全票当选“村委”主任

本报讯 亿万富翁刘群突破户籍制度,经重庆市里相关部门特批,由南岸区的城镇户口“非转农”到垫江县石岭村四社当农民。

13日,刚当农民十多天的刘群就在村委会领导班子换届选举中,被村民代表选为村主任。刘群在就职演说中称,要把贫穷落后的石岭村打造成西部的“华西村”。

当农民,梦想了20年

此前,刘群对外身份是重庆长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目前身家数亿元。今年刚开头,刘把自己在南岸区的城镇户口“非转农”,下到垫江县石岭村四社,成了一个地道农民。

垫江县政府有关人士称,我国现行户籍制度规定可以“农转非”,但并没有明文规定“非转农”。但为了城乡统筹,他们大胆突破户籍制度规定,通过市里相关部门作出特批。

亿万富翁去当农民,不少人说刘群“有点异”。刘称,他是农民的儿子,20年前母亲累死在庄稼地里。从那时起,他就拼命想跳出农村,然后发展壮大后又回到农村,可以说,想当农民想了20年。刘群说,之所以以前没回

只想让老百姓致富

垫江县是重庆市城乡统筹的试点之一,石岭村为此也刚由村改为社区居委会。

13日上午,寒风刺骨,但村民热血沸腾。他们通过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刘群全票当选。

刘群表示,他在石岭绝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不动一草一木,“我有钱,也不想让石岭图什么。我完全是在为全体村民打工。我的目的和动机就是想让当地老百姓致富,想让自己的操作模式能够让全国的农村来复制。”

城乡统筹一条新路

对刘群的“非转农”,重庆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蒲奇军称,城乡统筹就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企业家到农村去任村主任,实现以企带村,也许是城乡统筹的一条新路,值得探索。

蒲奇军还称,不管什么模式,只要不违背法律的大框架和基本原则,都是可以探索的。据《重庆晚报》



一只杯子 情牵两地

14日,杭州外来务工人员展示印有自己照片的杯子。近日,杭州市西牌楼社区专门为春节不能回家的外来务工人员免费制作了印有自己照片和西湖十景的杯子,让他们将这些杯子带回家,使他们的家人与其共享“第二故乡”的温情。新华社发

甘肃房产老板悼亡母 每平方米房降260元

本报讯 近日,甘肃天水一房产商将开发楼盘的房子每平方米降价260元以哀悼母亲病逝。消息传出后,市民反应不一,也引起了网友的争议。

随后记者证实了此消息。在水天某报2007年12月28日的《房产周刊》上刊登了该房产老总感言,感言写道:“……我决心要把这次降价的

事做到底,以表哀悼,愿天下的母亲都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以告慰她老人家在天之灵。”

对于房产商的行为,一部分人认为是在“尽孝道”,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是在“作秀”。一些网民认为,近几年国内房价都在暴涨,房价降价之举的确吸引眼球。天水老板降价房价的

确让人欣赏,但是降价不能和纪念母亲结合起来,二者结合就有点让人感觉是在作秀。

记者随后采访了该房产公司一中层干部,据她透露,楼盘降价的事情虽然是“老板的意思”,但都是他让下面的工作人员执行的。

她告诉记者:“我们是民营企业,老板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做。老板在丧母的悲痛之中,他怎么想的,我们都尽力去做好,把这样一个好事完成。”当记者提出想采访老板本人的要求时,她告知,老板去出差了,“他还沉浸在丧母的悲痛之中,不便于打扰”。据《西部商报》

ATM机竟吐出牛皮纸 男子报警讨说法

本报讯 取款1000元,可ATM机吐出来的却是9张100元纸钞和1张与百元纸钞相仿的牛皮纸,这怪事12日晚19:47发生在湖北来厦打工的朱波先生身上。

事发地点位于厦门市台湾街江头市场附近某家银行,记者赶到现场时,朱波已经和民警回派出所做笔录。在江头派出所里,记者见到现在在厦门某大酒楼上班的朱波先生,他一边把取到的钱和牛皮纸摊开,一边跟记者说,这顺序可都是按照ATM取出来时一样的,还没有动过。

接着,他向记者介绍事情的经过。“我按下1000元取款键后,钱就整叠吐出来,我拿到手后,摊开一看,奇怪怎么最底下一张颜色不一样,很像纸,整叠反过来再细看,原来是一张与100元纸钞相仿的牛皮纸,随即,我就把钱在取款机前晃了晃”,整个过程由他同事贺先生见证。两人随后赶紧拨打110报警,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据《厦门商报》

网上热传最差专业 标准单一遭质疑

本报讯 一篇名为《应届高三生必读:中国大学最差的17个专业》的博客文章近日被多家网站转载,一时间在长沙许多高三学生、家长以及不少大学生中,引发了一场热议。

曝光的所谓“最差的17个专业”中,曾令不少优秀高中生极为看好的“生物工程”竟然排到了第一位;而招生广泛的新闻专业也名列其中,三湘都市报就此采访了部分高校师生。

该博文点击率很高。作者不仅列举了17个专业,还写了人选择理由,该文章所提到的17个专业分别是:生物工程、法学、环境类、市场营销、信息管理、电子商务、国际政治和外交学、新闻、汉语言文学、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经济学、电子政务(信息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数学)、物理学、食品科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人选择理由是:“生物工程,国内甚至名校念到博士都没出路,除非是海归,还能教书。”“新闻,本科就业非常差,大多数学生只能去挤公务员的独木桥。”记者发现,尽管管理由各有不同,但归根结底还是基于“就业困难”的原因。

部分应届毕业生认为,排名不准确,但是有些代表性。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就业指导中心刘彬老师认为,该排行不科学,作者可能是依据某一个学校和某一个地域进行排行,其结论有失偏颇。但其中提到的某些专业的就业状况,确实不太理想。判断某个专业的好坏与差,就业率不能说明一切,而在于你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

刘彬说,除了法学专业要求太高,工作比较难找以外,其他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的工作不是特别难找,而是毕业生就业条件太高。“很多学生毕业总是不愿意去小公司,都盘算着进知名大公司,其实小公司是最锻炼人的,对毕业生也是最合适的。”据《三湘都市报》

新闻时评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szxw@zynews.com

时政点击

城管为何事故频发

据《法制日报》报道,今年1月8日,湖北省水利建筑工程公司经理魏文华路过该省竟陵镇湾坝村时,发现城管执法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他掏出手机录像时,被城管人员当场打死。

城管再次“失控”,出人意料,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岁末年初,我们可以总结一下2007年媒体眼中的“城管”,有不少“形象”是与野蛮、打伤、打残、暴力等关键词在一起。城管“事故频发”,绝非有人故意“妖魔化”。这些年来,为了塑造城管的良好形象,各个地方的城管局活动没有少办,广告也没少做。然而,一种有问题的制度,不可能因为墙面上的形象宣传而“脱胎换骨”。对城管“合法性”的质疑,来源于活生生的案例,更植根于我们对权力分配的理性思索。

曾经有做翻译的,琢磨了半天不知道“城管”如何翻译,因为英语环境中根本就没有对应的职业。最后,有人把“城管”翻成“INSPECTOR”,成了检查员、视察员,怎么看怎么像“监视者”,特别别扭。在公共制度上,城市管理,有工商、税务;城市卫生,有环保局、卫生局;治安,有110,有巡警。不论是就宪政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法理或实践上,城管都没有存在的依据和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城管“失控”的根本原因,在于城管权力配置本身。众所周知,城管“无所不管”。城管不是警察,却戴着大盖帽,管得比警察还多;城管不是工商执法人员,可对小摊小贩,他却可以任意罚款;城管也不是环卫局的,然而,如果你乱吐痰,他又可以向你撕罚单。总之,大到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小到市容与环境卫生,占道经营、小摊小贩,城管就像一个万金油,别人能管的他可以管,别人不能管的,他也能管。

我们知道,城管是应“创卫”而生的。创卫作为一个“中国特色”,其背后本质是一种强大的、高度集中的、无可置疑的行政权威。本来,一个城市卫生状况如何,市民的摆摊行为是否有碍市容,这是个“私事”。可是,在代议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市民很难通过自己的选票来表达看法。为了量化考核,只好建一些专门的部门来监督,其中,就包括所谓的“文明办”。于是,专司城市管理的“城管”诞生了。可以说,城管这个部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将众多执法权集于一身的职业,必然是严酷的。城管会不会也是如此?而沿袭封建法执法观念的权力“恫吓”,根本就与法背道而驰。

在我看来,总有一天,城管的执法权力,要回到警察、回到工商,回到环卫,回到卫生等部门的身上。我们也应该建立适当的过度机制,逐渐淡化城管的权力。 林金芳

地方公共决策与污染博弈

把法制意识日渐觉醒的公众和地方政府,放在一口舆论的“压力锅”里煮,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样,将地方公共决策与污染博弈,投放到沸沸的舆论“压力锅”中,也能带来非同寻常的结局。

上一年的地方公共决策评选,出炉了十大“镜鉴”。几个环境“镜鉴”,可谓闪亮闪闪。其中,污染博弈,直接影响到地方公共决策的价值取向。(本报1月9日报道)

在经济学的概念里,污染博弈是说,在一场极为重要的博弈中,不受管制,或缺乏管制的追逐最大利益的企业,由于采取利己主义的态度,向大气和河流排放污染物,造成污染危

机,使得市场的均衡达到危险的无效率地步。本土现实中,这样的实例,数不胜数。像“镜鉴”里的厦门PX项目,污染博弈中,出场的是有着各自利益诉求的三方。由于从一开始,地方政府就和资本捆绑在了一起,因而实际上是他们共同和公众博弈。资本的出手,无疑是基于成本的考虑。地方政府的选择,是为了形象和政绩。公众被迫参与角力,则是要保护环境及自己的生活品质。有一种结果也是会出现的,那就是地方政府做出不合民意的公共决策,从而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

厦门发生的污染博弈,最后以资本的退出而结束。这一公共事件,同其他地方发生的相类似的事件不同,

里面没有输家,而其中文明品格所具备的妥协二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巨大。地方政府在舆情面前退一步,便是海阔天空。地方政府虽是在压力之下作出符合民意的公共决策,但从被动走向主动的明智举措,更见人文情怀和社会文明,使得建立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新秩序在未来成为可能。

地方政府有效的环境公共决策,可以引导污染企业向好的方向移动。而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污染企业才可以长期生存。公众保护环境的行动,之于环境伦理的澄清,至为重要。他们的举动,实在也是为地方公共决策提供镜鉴。

罗金羽

少“泡”会议 多办实事

岁末年初,在呼和浩特召开的

大小会议有几十场。综观起来,这些会议内容大同小异,多是总结上一年工作、安排下一年工作,有的会议只是传达上级会议的精神。这些会议有些需要在这时候开,有些则不一定非挤在这个时候,还有些是完全可以不开的。

岁末年初,的确是总结、安排工作的最佳时机,但以今天信息传递手段之发达,如果只是学文件、念材料之类的会议,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达到目的。

更重要的是,“可开可不开”的会开多了,必然给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留下“形式主义”印象,减少各

级干部办实事的时间,影响实际工作,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群众生活中总会有大量实际问题需要解决,身为党政领导干部,应该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着力改善民生”要求,把心思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少“泡”会议,多办实事。 丁铭

电价下调不应止于广东

广东物价部门对广东电网公司的成本监审发现,去年广东电网的利润高达142亿,利润空间太大。为此,广东将进行电力价格改革,全面下调工业和居民的销售电价。平摊到居民家中,平均每户每月下降1分钱左右。

虽然每度电只是下降了1分钱左右,但每一分每一毛都是民生之重。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电价下调必将产生某种引导价值,来对当前垄断行业存在的不道德经济现象进行纠偏。

指望垄断主动去体恤民生艰难,往往是不现实的。去年电力行业利润增幅超过了50%,然而电企还不是照样抱团要求涨价。一边享受着行政保护,一边却不愿意担当社会责任。而垄断行业搬出来的所谓的“涨价成本”,往往又是一笔糊涂账,缺乏第三方的监督,完全由垄断企业自说自话。显然,把垄断成本纳入到公开透明的成本监审体系下,已经成为一种强烈的诉求。

此次广东物价部门对广东电网的成本监审发现,广东电网2007年利润竟然高达142亿,资产回报率高达11%,

大大超过了国际上6%到8%的平均水平。广东拟全面下调电价,体现的就是政府作为民生福祉守护者的角色本义。

在物价高企的年代,广东根据成本监审拟下调电价,这样的现象应该也在更大范围领域进行辐射。我们自然也更期待,能够通过成本监审来全面核定垄断的成本与利润,让这些享受行政保护的行业,履行其应尽的社会责任,从而彻底解开垄断行业可能勒在民生脖子上那根可怕的绳索。 苏渝

油企涨工资谁最有话语权

13日,某财经媒体报道,中石化系统正在酝酿一次工资普涨。至于工资具体何时涨,现在还未落实,只是确定了大致的方案。这则新闻一经互联网转载,迅即在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与以往油企“逼宫”涨价、电企上书提价、油企“哭穷”讨补贴时一样,这样的新闻引起了绝大多数网友的反感和声讨。

当然,这还仅仅是一则未经最后证实的新闻,普涨工资这一对中石化员工而言的“利好”最终能否兑现,还有待观瞻。不过,让人聊以自慰的是,在透明操作原则的底线之上,以及媒体监督空间增大的背景下,作为上市公司的垄断国企要想给员工涨工资,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私底下悄然进行了。一切“委屈”和“吃亏”、托词和借口,得送也罢了,被否决也要,都必须在公众舆论的目光之下遭到公开审视。

和此前一切垄断国企涨薪前的舆论铺垫雷同,据报道,此次中石化有关人士已经开始向媒体表达涨工资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了——“一位处级干部对本报抱怨,工资总额不到3000元,在目前物价环境下,日常开销完全靠效益挂钩的奖金,否则就‘捉襟见肘’”,“一位有着30多年工龄的员工则说,除奖金外,扣除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每个月到手的净工资才1000多元”……即使本着对报道此事媒体的客观精神和接受采访的相关员工的诚信度的尊重,我们仍极易在上述“诉苦”中找到明显的漏洞——“偏低的”只是工资,而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垄断国企员工,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并非工资,而是各种巧立名目、花样繁多的“福利”。

然而,有意思的是,这种众人皆知、众目皆见的偷换概念做法,在某些主管部门看来,却是可信度极高的证据,足以证明垄断国企员工一直在为中国经济和全民福祉默默作着无私奉献。

去年4月,国资管理部门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情况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据说,结果显示“垄断行业工资增长率远远低于竞争行业”;且“国有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仅4.16万元,垄断企业90%的职工工资不到5万元”!但几乎与此同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则披露,电力、电信、水电气供应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到3倍,若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

不同主管部门对垄断国企薪酬高低迥然不同的判断,值得我们反复玩味。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让我们依稀看到不同主管部门与垄断国企之间的差别,不同“亲疏”程度,也让人隐约能判断出哪组数据更公允、客观和中立。

但有些可恶的是,在这类数据打架、数据撞车的事件中,作为垄断国企真正“股东”的普通公民,却往往缺乏基本的话语权和博弈能量,“股东”(全体公民)对自己共同“出资(投资)”的垄断国企的员工究竟该不该涨工资、该涨多少工资,说不上话、使不上劲;相反,倒是“代理人”(国资监管机构、国企中层管理者)垄断了必要的信息和话语权。这恐怕算得上另一种“内部人控制”吧。其结果是,真正的“股东”的控制力和话语权只能无语消遁。 言和